

香港经济 与未来

(美)威廉·比瑟著
何伟文译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香港经济与未来

〔美〕 威廉·比瑟 著
何伟文译

中国时波经济出版社

William F. Beazer
The Commercial Future of
Hong Kong
Praeger Publishers New York 1978
根据纽约普雷格出版公司1978年版本译出

香港经济与未来

〔美〕威廉·比瑟 著
何伟文译
(限国内发行)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82开本 0.25印张 125,000字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统一书号: 4166·346 定价: 0.60 元

译 者 的 话

威廉·比瑟是经济学博士，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经济系教授，曾数次担任美国政府驻若干发展中国家政府的顾问。

本书出版于一九七八年。作者在这本书中，比较全面地考察了香港地区的历史、社会经济结构和香港当局的经济政策，分析了香港地区的经济特别是贸易和金融业迅速发展的历史原因、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

本书提供的某些资料和分析，可供我们研究香港地区问题时参考。但由于作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和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进行分析的，因此，某些内容、观点和提法是需要读者在阅读中加以鉴别和扬弃的。

本书译稿承外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韩克信同志审校，谨在此致谢。

由于水平所限，书中错误和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一年七月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导言.....	(4)
第二章 香港当局.....	(8)
一、经济哲学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	(8)
二、香港当局的结构：综览	(25)
三、财政预算	(31)
四、香港当局的职能	(38)
五、香港当局的收入	(47)
六、政策方向	(57)
第三章 香港的经济.....	(63)
一、经济增长与就业	(63)
二、英、美在香港的利益	(85)
三、香港的土地政策	(90)
四、经济前景	(94)
第四章 货币和金融制度.....	(98)
一、早期的货币本位	(98)
二、金融制度的现状	(103)
三、银行体系	(115)
四、证券交易所.....	(128)
五、黄金市场	(132)

六、商品市场	(133)
七、国际银行业和亚洲美元市场	(136)
八、金融趋势——海外债券市场	(144)
第五章 香港地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152)
一、引言	(152)
二、商业关系	(153)
三、中国的石油工业	(172)
四、政治和中国的国内政策	(179)

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年代中，远东发生了许多经济、政治大事。中国、朝鲜、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支那都成了或大或小的冲突和政治变化的舞台。此外，在当代突出的经济成就中，其中有些出现在日本、南朝鲜、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但最令人惊异的经济成就，却发生在中国海岸一个小小的地区，就其性质来说，充其量只能算做世界大多数国家中的一个大城市而已。香港作为英帝国的残余，创建于十九世纪中叶，为的是满足纯粹的经济目的。自那以后，它努力保持那么一种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这种体制和结构会使亚当·斯密感到欣慰，认为这是《国富论》全部内容所论述的（无论善与恶）近乎完备的说明。

凡途经香港的人，很少有不被它的自然特征或它的居民一心一意地献身于赚钱事业所打动的。有些人发现，这个岛屿和港口，特别是夜间从太平山顶向下看，是世界上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并赞许地把那紧张繁忙的商业活动看做只不过纯粹是任其表现的、放荡不羁的企业家能量发挥的结果。另一些人则把它看作是污秽、肮脏、拥挤不堪和令人不愉快的都市社会，并厌恶地看待社会活动中商业的重要性和社会对其成员的缺乏控制。

从一则左翼的批评中可以看到后一种观点的例子：“实际上，香港所起的作用，就象是英国的一个海外岛屿。在那里，赋税不及英国国内的一半，偷税漏税轻而易举，工资低得可怜，经济增长率为英国的二、三倍，甚至四倍，也没有外汇管制之类的问题。此外，香港这个地区还处在过去十年中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区——东南亚的中心”*。

除了“工资低得可怜”之外，其余的这些谈论都是比较真实的，但这些话有批判的意味。如果从不同的角度考虑，倒会觉得这些话完全是一种赞许，如同经常见到的那样，对事实远不如对其解释或所具含义更易引起争论。

本书并不打算对香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的或面面俱到的探讨，它将集中探讨贸易和金融，这是香港过去的经济增长和未来潜在的经济增长中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同时，对于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可能起到的作用，也给予相当大的注意。本书原系防务分析研究所支持的一项研究工作，于一九七四年作为 IDA P-1071 号研究资料《香港的未来》发表。对于防务分析研究所在本书编写中不断给予的鼓励，诚表谢意。

在一本本书的原稿写作中不可避免地会有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参加进去，因而作者应致谢的方面是很多的。感谢香港大学的莫里斯·莫克教授和 Y·C·姚教授，他们同我进行了多次有价值的交谈并举行了盛宴。美国财政部的威拉德·夏普先生帮助安排了同香港金融界各方的会晤，米歇尔·阿

* 《香港：一个待回答的问题》（伦敦：发言人丛书，1974年）。

努尔菲慷慨地赐予了他的时间和才华。香港当局和银行界中曾与我交谈并如此友善地提供资料和观点的人则多得无法一一列举。还应感谢罗斯玛丽·海斯、彼得·科姆、迪安·卡弗和哈里·威廉斯。特别要感谢伊夫琳·科尔和塞林达·格拉夫绘制了各种图表。当然，错漏之处皆由我个人负责。

威廉·比瑟

第一章 导 言

香港毗邻中国东南沿海的广东省，由三个小区组成：香港岛、与香港岛隔海相望的小小的九龙半岛和尖沙嘴岛，以及与大陆接壤、面积三百五十七点五平方英里的新界。这块面积三百九十八平方英里的大部分地区是陡峭的山丘和岩石裸露的地面，只有新界的一部分地区适于从事农业生产。可耕地约占土地总面积百分之十四，食品供应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须靠进口。除了它那风光绮丽、带有屏障的天然港（也许是中国沿海最好的港口）外，这个地区差不多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主要城市地区是香港岛上的维多利亚以及港口在大陆一边的九龙。

一九七七年年中，香港人口约四百五十万，其中百分之九十九是华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人口为一百六十万。战争结束时减少到六十万左右，原因是居民纷纷逃离日本的占领以及日本人实行大规模的驱逐政策。等到英国恢复统治后，人口下降趋势即告扭转，到一九四七年，人口达一百八十万左右，比战前超出二十万。中国的连绵内战和共产党最终获得胜利，使移民进一步增加，到一九五一年，人口已达二百零二万左右。此后人口的增长，绝大部分是自然增长的结果^①。居民平均年龄较轻，在二十四岁以下的占半数还多。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一万人以上，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

的地区之一，其中百分之八十的居民居住在九龙和维多利亚。

英国人于一八四一年获得了香港岛，这是英国想在中国沿海取得一个在英国控制下的受到安全保护的贸易中心的结果。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正式结束时签订的南京条约，将该岛永久割让给英国。九龙半岛和尖沙嘴岛是一八六〇年根据北京条约取得的，也是永久割让。此后在展拓界址中（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年）取得了新界（包括大屿山岛），租借期九十九年，应于一九九七年到期。

香港于一八四一年宣布为自由港，在后来的一百年中成为英国与华南贸易的中转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占领期间，经济被破坏了十分之一以上，但随着英国人的卷土重来，很快又恢复了中转港的活动，贸易额迅速增长。但由于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随后联合国对华实行的战略物资禁运和美国禁止对华一切贸易后，这一发展立即中断。为了弥补对华贸易的损失，香港大批难民将其技术和资本转入制造香港产品，供应出口市场。香港产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一九五〇年的大约百分之十五增长到一九五九年的百分之七十左右，目前它可提供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其余是转口。一九五〇年以来，香港这个地区表现出了举世无双的经济增长力和灵活应变的能力。

然而，有一个重大因素暗淡地笼罩着它的未来，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这个地区继续保持现状的态度。从共产党执政之前起，中国的基本立场便是：香港乃处于英国统治之下，这是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的结果。他们认为，按照他们对国际法的解释，这些条约没有什么效力。因此，如何处置香港的命运，那是中国的内政。坚持这一观点的最近一次声言，见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于一九七二年三月八日致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主席的信*：

“众所周知，香港和澳门问题是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造成的一类问题。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完全不属于‘殖民地’这个一般的范畴。因此，不应列入《给予殖民地和殖民地人民独立宣言》中所包含的殖民地清单。关于香港和澳门问题，中国政府一贯表示应在条件成熟时通过适当方式解决，联合国无权讨论这些问题。鉴于上述理由，中国代表团反对把香港和澳门列入《宣言》中包含的殖民地清单，并要求立即将香港和澳门属于‘殖民地’范畴这一错误措辞从特别委员会文件及联合国其他所有文件中除去”。

关于他们同香港的关系，中国人的立场是清楚的。至于以何种方式、什么时间以及是否改变它，则很含糊不清。如果香港全部已被永久割让给英国，则对香港的中期的未来恐怕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公开关切。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这并不会给英国人更大的权力，而仅仅是因为还谈不上具体的日期。新界的租让则不同，它将于一九九七年到期。一般估计，届时或在这之前，中国人会作出某种决定。

由于香港地理位置的缘故，只要什么时候北京政府愿

* 该委员会全名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

意，就随时可以毫不费力地收回来。但中国和香港之间有一种相当强有力共生关系，香港从中得到的好处是能够有比较低廉的水、食品和消费品的供应；中国则得到外汇和国土外的一个场所，在那里同世界其他国家做生意，感到很舒适方便。因此，香港问题的结局究竟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要看这种共生关系是否继续对中国有利，以致足以使解决此问题的“适当方式”不致摧毁使香港成为世界上最有魅力的经济实体之一的那些特征。

本书内容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简要考察过去十年来香港经济的性质和成效。第二部分探讨港府的职能和政策。第三部分研究香港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国际方面之一——金融市场的发展作用。最后一部分分析香港同中国的关系，并试图估价香港在目前制约经济行为的那种法则不继续存在的潜力。

【注释】

① 戴维·波德莫尔：“香港的人口”，见基思·霍普金斯编《香港：工业殖民地》（香港和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

第二章 香港当局

一、经济哲学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

香港当局的经济哲学，可以说是以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为特征的。这个地区对私营部门合法活动实行的当局控制和限制，恐怕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少。没有保护关税或补贴，也不企图通过制订计划去指导私人活动。它鼓励实行竞争的自由企业制度，另外同样重要的是，它实际上从不试图改变价格要素，使之有利于任何一类特定项目或工业。当局没有实行投资津贴、免税期，也不对小企业给予优惠待遇（除对利润实行略带累进税率的税收制度外）。

在宏观经济方面，不重视货币和财政政策，当局丝毫不想具有操纵经济的愿望或能力。这种不承担控制商业循环的责任，不单是有思想信仰的缘故，而且有其坚实 的 经济 基 础，扎根于香港经济的体制结构之中。在转到考察香港当局表现活跃的领域之前，值得仔细研究一下什么原因使货币和财政政策看来没有什么价值。

首先，不实行重大的体制变革，而要想奉行一项积极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香港的货币制度是汇兑本位制，由私人银行凭百分之百的外汇储备保证金发行货币。结果，其调节机制隐约表现出金本位制的特征，只有货币供应量大

多是由内在因素决定。外汇储备的多少取决于对外收支的变化。储备作何用途，取决于各个个人和机构的决定。正是这些决定，而不是当局的决定，确定了这些储备中有多大一部分用来支持货币。因此，在目前的体制安排下，实行纯粹的货币政策是不可能的。不同时改变财政支出或征税数额，当局是无法控制货币供应量的。

排除了货币政策后，当局能够采取的总体经济政策，只涉及到为了影响生产总量而实行的税收，财政支出和赤字预算间的巧妙转换。但财政政策和赤字开支的余地也是有限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必须研究一下当局如果想进行赤字开支，可以怎样筹集货币。弥补赤字可以有三种方式：国内借贷、国外借贷和削减当局从过去盈余中建立起来的结存。没有一个中央银行，这意味着当局不能用印刷货币来抵补赤字。

可以预计，本地筹集资金的效果将和国外筹集资金大不相同。如果当局拟在本地借贷，随着债券的出售，货币供应量将趋于下降。当香港当局将这笔钱花掉时，货币供应量又将增加。债券的出售和债券实收款项的支出二者合起来所带来的经济行为的任何净变动，将取决于需求如何而转变。在香港这样开放的经济里，有多种可能性。如果借来的钱，本来是会全部投资到海外的，现在却在本地花掉，那么，货币供应量和本地需求在有赤字比无赤字时要高些。另一方面，如果借来的钱，本来是要用在本地投资，当局却把大多数支出最终花在进口上，那么，货币供应量将会下降，本地需求可能减少，原因是企业家没有资金投资。换言之，直接影响

无法预测，但取决于借钱人和接受当局付款的人两者的行为。

但也可能发生一些间接影响，如果由本地筹资弥补的赤字造成了货币供应量的下降，价格或汇率也可能下跌。如其中有一种情况发生，国外需求则可能增加，从而推动经济回升。但在这种情况下，赤字便会带来在香港还存在着失业的问题时可能发生的情况。

替代本地筹资办法是国外借贷和耗尽当局的外汇结存。在这两种情况下，后果将几乎相同，因为两者都涉及到以外汇形式将国外资金带入本地经济中，由当局去花费。这些资金的支付将直接增加香港地区的实际收入，但能否提供持久的刺激，将取决于受援者的行为。为要开销，当局必须把外汇兑换成港币。开支过程将增加货币供应量和实际收入。本地要求将会增加多少，这要看进口倾向，一般估计这是相当高的，花费在进口上的倾向越高，对本地需求的影响便越小。

承担整个债务的负担，或当局售出了一部分可以生息的外汇，将使今后的收入减少。目前这种对外成本的金额，当然恰好与赤字额相等。如果纳税人减少消费，以适应他们预计的纳税后财富水平的降低，这样，就会将当局扩大开支，刺激经济的作用抵消掉。在进口倾向高以及由于预计纳税负担将会增加而削减支出的情况下，以国外资金弥补的赤字可能对本地需求没有什么影响。此外，由此引起的货币供应量和本地需求的任何增加，将促使价格下跌的刺激减弱，香港的出口商品，将不如无赤字时有吸引力。

这样，如果在国外借贷，当局的开支最初将使货币供应量增加。接着私人部门在出口或对外投资上的开支将部分扭转这一过程，消费水平会暂时提高，但由于要替债务还本付息，今后则需要提高税收，从而减少了当前和未来的消费。此外，这一过程将同香港调节物价以适应国外需求转变的正常过程发生矛盾。

另一方面，本地借贷的直接影响无法预测，这将取决于借款人和当局开支的承受人两者的行为。有这种可能，如果由于本地借贷减少了货币供应量，但它却使香港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更有吸引力，从而刺激国外需求，那么也会带来有益的结果。但只有在香港的工业社会不象往常那样通过削价来适应世界需求下降的情况下，这种过程才有价值。

这样，即使香港当局试图采取财政政策行事，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小。在香港，货币政策或任何试图在本地运行的政策方面存在的基本问题是，香港是按照国外的音乐跳舞的。出口为香港提供了生计，国外需求下降时，本地产量也下降。下面将会看到，通过对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的情况的考察，发现香港对付经济下降的最好武器是增强竞争能力。

至此，讨论的一般要旨意味着，有决断作用的财政政策，即便在香港不可行，但对于企图达到某种宏观经济目标的其他国家来说，还是有价值的。但基于理论上和经济上的理由，财政政策的效能究竟怎样，已引起越来越多的疑问。还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当局通过运用税收和支出措施，可以在时间和程度上用可预测的方式来影响就业和产量这样的宏观经济变数。此外，近来的理论工作表明，如果对于当局的行为